

教育何以助推第三次分配公平？ ——基于教育“经济—人文”双重价值的实证探索

王 鑫¹，刘 钺²，云如先²

(1.南京财经大学 粮食和物资学院, 南京 210023; 2.南京大学 教育研究院, 南京 210023)

摘 要:三次分配是我国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教育在理论上应是贯穿三次分配并促进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然而,以往研究多关注教育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作用,较少关注教育在第三次分配中的作用。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使用工具变量法,探索教育在提升个人捐赠方面的作用和机制。分析发现,教育能显著提高个人的捐赠参与率(10.1%)和捐赠金额(8.4%),捐赠参与率的提升依赖教育“经济—人文”双重价值的协同效应,而捐赠金额的增加却主要依赖于教育的人文价值,其中,社会互动是关键。教育在促进第三次分配中具有关键作用,其人文价值的重要性大于经济价值,且增强教育过程中的社会互动性是发挥教育人文价值的关键。

关键词:共同富裕;三次分配;教育;捐赠;社会互动

中图分类号:F08;G4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870(2024)06-0025-12

一、教育何以助推第三次分配公平

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中央财经委员会于2021年8月17日将第三次分配纳入我国的基础性制度安排^①,形成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相协调的收入分配格局。在世界各项缓和收入差距的手段中,第三次分配是中国的独特理念,其最早由厉以宁先生提出,核心思想在于依靠道德力量促进

个人之间的转移支付,即个人的自愿捐赠,进而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基础上形成收入的第三次分配^{②-③}。然而,根据《中国慈善发展报告》、“世界捐赠指数”(World Giving Index)等最新数据显示,中国个人捐赠金额较低,占捐赠总量的比例偏小(见图1),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④,其在捐赠领域的表现尚有较大提升空间,并在全球排名中相对落后^⑤。为此,需大力提升我国个人捐赠的社会总量,以完善第三次分配,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课题(BIA23018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2273061)。

作者简介:王鑫,女,南京财经大学粮食和物资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教育经济、粮食经济研究;刘钺(通讯作者)/云如先,男,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从事教育经济研究。

①2020年我国个人捐赠总额尚未超过400亿元人民币,远小于美国同年的个人捐赠总额3241亿美元,且中国个人捐赠的占比大约为25%,亦远低于美国同期69%的比例。中国的数据源于《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22)》,美国的数据源于Giving USA发布的《In 2020, Americans gave \$ 471.44 billion to charity, a 5.1% increase over 2019》, https://givingusa.org/wp-content/uploads/2021/06/GUSA2021_Infographic-Digital.pdf。

②据Charities Aid Foundation从2010年开始统计的“世界捐赠指数”(World Giving Index,统计范围包括一百四十多个国家),中国的排名均在140名左右,偶尔升至130名左右,但在COVID-19发生后(2020年末统计),中国的排名正在上升,2022年已升至49名。排名的上升原因一方面可能是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出台,另一方面是因为COVID-19的影响。数据来源 <https://www.cafonline.org/about-us/research/caf-world-giving-inde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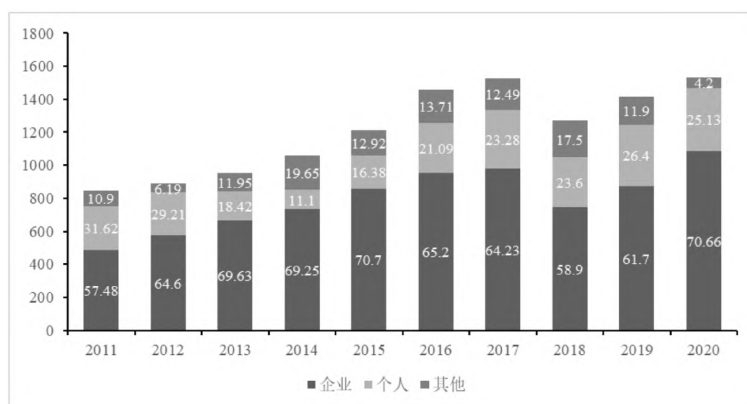


图1 2011—2020年社会捐赠金额及构成^①

注：数据来源：杨团，朱健刚.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22)[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28.

在推动社会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教育被视为少数能够同时对三次分配产生影响的关键政策工具之一^[4]。尽管如此，现有文献主要集中于探讨教育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功能，而对其在第三次分配中的作用关注不足。传统研究通常基于教育的经济价值来解释教育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一方面，教育通过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进而促成收入的均衡化，但从宏观层面来看，基于皮凯蒂等学者的观点可发现^[5-7]，教育的不平等现象仍旧限制着教育在初次分配中的作用^[4,8]；另一方面，政府通过为欠发达地区提供补偿性的公共教育服务，同样试图以教育的经济价值来促进这些地区个体的收入提升^[9]。然而，若将探讨拓宽至第三次分配领域，教育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可能呈现出更加多元的维度——不仅体现于教育提升个人收入的经济价值层面，更延伸至教育如何激励个体为社会做出捐赠，从而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上促进资源的公平分配。

事实上，教育对人发展的作用是全面的，不仅能够促进人的人力资本，还能培养民众的社会参与度和责任感，提升国民之间的互信力与凝聚力。因而，教育的价值是多维的，既包含经济价值，亦涵盖非货币性的人文价值^[10]。近年来，随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开始逐步推广社会情感能力(Social and Emotional Skills)的概念^[11]，教育在促进个人社会化过程中的人文价值亦逐步引起实证研究的关注。从该视角出发，若在分析教育的经济价值时，同时兼顾其人文价值，则可能会发现教育不仅能够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阶段，而且也能够第三次分配中扮演重要角色^[12]。

那么，关键的问题在于，这些由教育所带来的经济及人文产出能否有效地转化为捐赠行为？为进一步证实教育对共同富裕的独特贡献，探索教育在促进第三次分配公平中的关键作用，本研究以教育价值分类为基础构建了“经济—人文”双维理论框架，旨在综合考量教育的经济价值和人文价值如何共同作用于个人捐赠，从而助推第三次分配的公平性。为实现该目的，研究使用2018年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ies, 简称CFPS)，并运用工具变量法与中介效应模型，估计教育对个人捐赠行为的影响，探究其影响机制，以期教育为收入分配公平关系的理论提供新的实证依据，并就教育如何有效促进社会共同富裕提供政策建议。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

(一)文献回顾：教育对捐赠行为的影响

捐赠行为，既被视为市场分配中的一种经济活动，涉及货币收入或财产的单向流动，亦是属于一种在道德评价体系中被视为高尚的道德行为^[13]，其历来为经济学及社会学领域内的经典文献所关注。在经济学领域，尽管捐赠行为似乎与古典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存在冲突，但早期的经济学家仍试图将捐赠行为纳入经济分析的框架。例如，Becker(1976)将经济分析的范围扩展至所有人类行为及其决策过程，其中就包括基于利他主义的捐赠行为，他假设利他主义者之所以进行捐赠，是出于最大化团体总收入的目的^[14]。然而，一项基于以色列捐赠日^②的经济学实验研究发现，虽然提供10%的奖励给高中生能够使得高中生比提供1%

①2018年的捐赠变化，主要是由医疗捐赠折价下降导致，详情见报道：<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39086941353066231&wfr=spider&for=pc>。

②即“Donation Days”，在活动日中，公众为癌症研究、残疾儿童等募捐，实验中的高中生挨家挨户收集捐款。

的奖励时收集更多的捐赠金,但所收集的捐赠金额均显著少于无酬劳组^[15],这一实验暗示公益行为并不完全遵循“理性人”的假设。

继 Becker 之后,经济学界开始逐渐认识到捐赠动机的社会属性。一个突出的理论贡献是由经济学家 Andreoni(1990)提出的“非纯粹利他主义”模型及其衍生的“温暖满足感”(Warm-Glow)理论,该理论揭示捐赠行为可能受到社会压力、内疚感、同情心以及追求内在满足感等多重因素的交织影响^[16]。这些发现进一步支持了捐赠行为并非由单一的经济利益驱动,而是深受社会规范的制约。此观点与古典社会学家 Weber(1978)关于行动特征的论述也相呼应,Weber 认为某些行动是出于对社会规范的无条件实践,其反映着个体对荣誉、美、宗教信仰、个人忠诚等价值的追求^[17]。在当代社会学领域,帕特南的经典研究进一步证实了捐赠行为的这一特点,指出宗教参与等社会资本形式是捐赠行为频率和强度的重要预测因素^[18]。总结而言,捐赠行为虽在某种程度上遵循“理性人”假设,但更多的是被社会规范所驱动。

教育作为一种能够通过控制环境而有效塑造个体行为和心理的手段^[19],可能是促进捐赠行为的关键因素之一。研究普遍揭示了一个跨文化共性:较高教育水平的个人更倾向于参与慈善捐赠活动。这一趋势在各国研究中有所体现,如美国成年人数据^[20]、日本^[21]以及中国的辽宁^[22]、福建和江西省^[23]的数据均支持这一观点。这一现象不仅在宏观层面得到广泛认可,深入研究也表明教育水平对不同类型慈善捐赠的影响效应各异。例如,教育水平与非宗教性质捐赠之间存在正相关性,而对宗教捐赠的影响则较模糊^[24]。此外,教育水平与环境保护、发展援助及人权领域捐赠之间存在正相关性,而与健康照顾类捐赠呈负相关^[25]。这些研究强调了教育如何根据捐赠领域的差异影响慈善行为。另有研究揭示了不同地区教育对捐赠影响程度的差异。例如,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家庭平均受教育水平每提高一年,农村家庭持续捐赠的可能性显著提高 83.3%,这一比例约是城市家庭相同指标提高效果的 2.5 倍^[26]。

纵览现有文献,相关实证研究均发现教育水平在促进个人捐赠行为过程中起着积极作用,然而,相关研究仍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不同于以往研究,本文从研究视角、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三个方面深化对该议题的理解。首先,以往的实证研究多关注教育与初次分配、再分配的关系,本研究从教育与第三次分配的视

角,来进一步验证教育促进共同富裕的独特作用。其次,研究在强调教育的经济价值基础上,重点探讨教育的人文价值,并探索教育的“经济—人文”双重价值能否有效转化为个人捐赠行为,以此来探索教育作用于个人捐赠行为的具体机制。最后,为检验教育水平与捐赠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并解决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本研究采用工具变量法,以期提供更加准确和可信的估计结果。

(二)经济—人文:基于教育价值分类的分析框架

教育作为一种培养人的社会活动^[27],旨在有意识地影响人的身心发展^[28]。从个体层面来说,综合已有关于教育价值的论述,可将教育对于个体的价值分为货币性价值和非货币性价值两大类。

从教育经济学的角度,教育的价值一般是指货币性价值,其主要体现在教育能够产生的经济收益上,具有明显的经济属性。人力资本理论强调教育通过提升个体的知识、技能等因素,进而提高其收入水平^[29]。此外,“明瑟方程”也证实受教育程度、实际工作经验两种人力资本形式对增加个人收入的积极效应^[30]。可见,这些理论所侧重的均是由教育带来的能够产生经济收益的部分。

除货币性价值外,教育还会产生重要的非货币性价值——主要是指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收益的部分,具有明显的人文属性^[10]。正如古典社会学家涂尔干提出,“教育是年轻一代系统性地社会化的过程”,旨在引导个人步入“道德和社会生活”^[31]。这种定位于“道德和社会生活”的主体社会化追求,并不总是能够直接转化为经济收益,无法用传统的经济指标加以衡量,他们更多体现为个人观念与行为实践的內化。

综上所述,教育的价值在理论上可被划分为货币性的经济价值和非货币性的人文价值两个主要维度。

基于此,若探讨教育与个人慈善捐赠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则可从理论上预见,该影响应通过教育的经济价值与人文价值两大方面的合力作用来实现。具体表现在:一方面,在经济层面,教育通过提高个人收入而增强个人的可支配资源,从而为捐赠行为提供实际能力;另一方面,在人文层面,教育通过提高个人的社会化程度而为个人进行捐赠提供内在动力。另外,考量个人的社会化程度不仅需要考察其价值观念如何,而且也需要考察其实际付诸的实践如何。为此,个人的社会化又可分为观念的社会化和实践的社会化。具体而言,教育既可能塑造个人的社会观念,如培养其积极的利他意识,也可能推动个人实践层面的

社会化,如帮助个人更好地参与社会互动,从而促进个人的捐赠行为。教育的人文产出与经济产出相辅相成,有望共同推动个人的捐赠活动,从而为第三次分配乃至共同富裕的实现做出贡献。

因此,本研究采用“经济—人文”双重价值的分析框架,全面评估教育对个人捐赠行为的影响,其中,“人文”又被分为观念和实践两方面。相较于只关注经济价值的传统解释,同时考虑教育的经济价值和人文价值将更加全面地刻画教育在促进共同富裕过程中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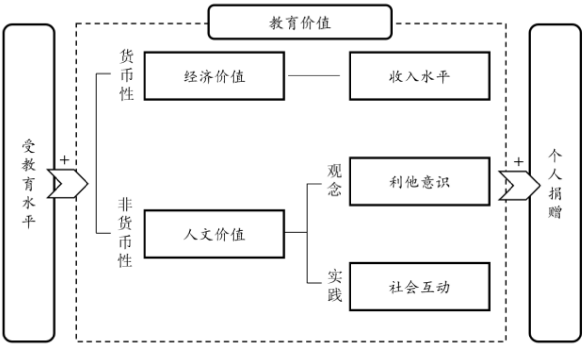


图2 受教育水平影响个人捐赠的理论框架

三、研究设计、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一)研究设计

1.基准模型

首先,为了考察教育对个人捐赠参与的影响,本文设定 Probit 模型:

$$Donation_i = \alpha + \beta_1 educ_i + \gamma X_i + \epsilon_i$$

在模型中, i 代表受访者, $Donation_i$ 代表受访者是否参与捐赠,若参与捐赠,则取值为 1,否则为 0。 $educ_i$ 代表受访者的受教育水平,取值为 0~22。 X_i 代表一系列控制变量。 ϵ_i 是随机干扰项。

其次,由于因变量捐赠金额中存在大量 0 值,普通最小二乘法对于包含截尾变量模型的估计可能会产生偏误, Tobit 模型可以克服 OLS 回归的缺陷。因此,研究采用 Tobit 模型估计教育对个人捐赠金额的影响:

$$Donation_num_i = \alpha + \beta_2 educ_i + \gamma X_i + \epsilon_i$$

在此模型中, $Donation_num_i$ 代表受访者捐赠金额的对数值,其余变量与前述模型相同。

2.研究方法

鉴于教育作为一项人力资本的投资,可能受到多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因而,即便引入若干控制变量,直接探讨教育对个人捐赠行为的影响,仍然可能面

临内生性问题的挑战。为克服该局限性,本研究采用工具变量法,即寻找与主要解释变量(受教育程度)高度相关,但对于因变量(个人捐赠行为)无直接影响的变量,以此消除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本研究采用 1999 年中国高等教育扩招政策作为工具变量,探讨教育对捐赠行为的影响。该政策旨在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使高校招生人数从 1998 年的 108.36 万人增加至 2023 年的近 1200 万人,实现了超 10 倍的增长。鉴于该政策显著提升了特定地区的受教育水平,与个人捐赠行为无直接关联,因此是理想的工具变量。考虑到小学入学年龄约为 6 岁,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的年龄约为 18 岁,因此政策主要影响 1981 年 9 月及以后出生的个人。依据现有文献^[32-33],将 1981 年 9 月及以后出生的个人赋值为 1,之前出生者赋值为 0,构建“是否受到高校扩招政策影响”的虚拟变量,作为本文工具变量。研究将在基准回归后,采用两阶段工具变量法 (IV) 进行估计,首先构造第一阶段方程,识别高校扩招对受教育水平的影响:

$$Educ_i = \alpha + \beta_3 D_i + \gamma X_i + \epsilon_i$$

上式中, D_i 是工具变量,表示个人是否受到高校扩招的影响,其余变量与前述模型相同。其次,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构造第二阶段的回归方程:

$$Y_i = \alpha + \beta_4 Xhat_i + \lambda X_i + \epsilon_i$$

上式中, Y_i 代表捐赠参与或捐赠金额, $Xhat_i$ 是第一阶段回归得到的 $educ_i$ 的预测值, β_4 是我们关注的估计系数,它代表受教育水平对个体捐赠的影响结果,其余变量与前述模型相同。

(二)数据来源

为评估教育水平和个人捐赠行为之间的关系,本研究使用 2018 年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以下简称 CFPS)进行分析。CFPS 项目是一项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主导的跨学科、大规模的综合性社会科学跟踪研究。该项调查致力于通过对个人、家庭和社区层面的长期数据追踪,深入掌握中国社会结构、经济发展、人口动态、教育演进及健康状况等多方面的演变。

在 CFPS 个人库中,原始样本为 37 354 个。基于研究需要,本研究对样本做如下处理:(1)排除在关键变量中出现“不适用”“不知道”或“拒绝回答”等缺失值的样本;(2)剔除仍在就学阶段的样本,由于这部分群体的受教育程度尚未定型,其数据不足以准确反映受教育水平对捐赠行为的影响。在进行以上筛选和缺失值剔除后,研究最终获取有效样本 19 470 个。

(三)变量选择

1.因变量。本研究将个人捐赠行为作为因变量,细分为:捐赠参与和捐赠金额。捐赠参与指个人是否有任何形式的捐赠行为,而捐赠金额则指个人捐赠的具体数额。具体地,研究利用 CFPS 2018 年版问卷数据,选择相关问题作为代理变量。具体而言,通过“过去 12 个月,您是否个人向任何组织或个人捐过款”来评估捐赠参与;通过“过去 12 个月,您个人所有捐款的总额大概是多少元”来衡量捐赠金额。研究旨在通过对这两项变量的分析,从受教育水平的角度探索并解析个人在慈善捐助领域的参与程度和捐助规模的差异表现。

2.核心解释变量。为准确评估个人受教育水平对其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本研究采用受访者所取得的最高学历作为受教育水平的衡量指标,这一选择基于现有学术文献的共识^[34]。依据 CFPS 提供的指导手册中关于最高学历与受教育年限的换算标准,本文进一步构建核心解释变量——个体的受教育年限。受教育年限细分为八个层次,并依据具体的教育阶段进行量

化赋值。具体地,文盲或半文盲=0,小学=6,初中=9,高中(包括高中、中专及职业学校)=12,大专=15,本科=16,硕士研究生=19,博士=22。此分类方法旨在精细地反映个人受教育年限的微观差异,并为后续统计分析和实证检验奠定基础。

3.控制变量。为最大限度减少因遗漏变量可能导致的偏误,本文参考相关文献,选取了一些控制变量。在个人层面,包含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是否为男性)、健康状况(身体康健程度)、政治身份(是否为党员)、宗教信仰(是否信奉佛教)、就业状况(是否为公职人员)、医疗保险(是否享有公费医疗、是否享有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主观福祉(居民幸福感),这些变量可能会对个人捐赠行为产生影响。在家庭层面,所考虑的控制变量包括家庭人口规模以及家庭类型(是否为离异家庭),这两者均可能会影响个人的经济状况和社会行为,从而影响其捐赠行为。此外,为了缓解潜在的混淆因素所带来的影响,本研究还同时控制了省级固定效应与城乡固定效应。上述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详细报告于表 1 中。

表 1 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因变量	捐赠参与	19 470	0.210	0.407	0.000	1.000
	捐赠金额(元,取对数)	19 470	1.036	2.098	0.000	13.122
核心解释变量	受教育水平(年)	19 470	7.073	4.934	0.000	22.000
个体特征	是否为男性	19 470	0.467	0.499	0.000	1.000
	身体康健程度(1~5)	19 470	3.046	1.234	1.000	5.000
	是否为党员	19 470	0.012	0.111	0.000	1.000
	是否信奉佛教	19 470	0.348	0.476	0.000	1.000
	是否为公职人员	19 470	0.087	0.282	0.000	1.000
	是否享有公费医疗	19 470	0.014	0.118	0.000	1.000
	是否享有城镇职工医疗保险	19 470	0.136	0.343	0.000	1.000
	居民幸福感(0~10)	19 470	7.466	2.195	0.000	10.000
	家庭人口规模(人)	19 470	4.240	2.101	1.000	21.000
	是否为离异家庭	19 470	0.031	0.174	0.000	1.000

四、教育显著影响捐赠行为:从捐赠参与到捐赠金额

教育始终被认为是缩减收入不平等、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工具。通过基准回归和工具变量回归,本研究验证了教育在促进个人捐赠行为(既包括捐赠参与,也包括捐赠金额)中的重要作用,也即教育在第三次收入分配中扮演的关键作用。

表 2 的基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教育水平对个体的捐赠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这一效应不仅体现

在捐赠参与的概率上,也显现在捐赠金额上。具体而言,如表 2 所示,模型第(1)列和(3)列呈现了未加入控制变量时的分析结果;而第(2)列与(4)列则呈现了在加入控制变量并考虑省份及城乡固定效应后的回归结果。在 Probit 模型的估计中,我们发现受教育年限的提高对个体参与慈善捐赠概率有正面影响。具体来说,个体的受教育年限每增加 1 单位,其参与慈善捐赠的可能性会增加约 1.8%。此外,受教育年限对捐赠金额的影响也有类似的积极效应。在控制其他相关因素

后,Tobit 回归分析表明,每增加 1 单位的受教育年限,个体的捐赠金额预期会增长 10.2%。

表 2 受教育水平对个人捐赠行为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捐赠参与	捐赠参与	捐赠金额	捐赠金额
	Probit	Probit	Tobit	Tobit
受教育年限	0.021*** (0.000)	0.018*** (0.000)	0.116*** (0.004)	0.102*** (0.004)
是否为男性		-0.000 (0.006)		0.033 (0.031)
身体康健程度		-0.009*** (0.002)		-0.050*** (0.013)
是否为党员		0.062** (0.022)		0.335** (0.116)
是否信奉佛教		0.046*** (0.006)		0.259*** (0.032)
是否为公职人员		0.057*** (0.009)		0.285*** (0.052)
是否享有公费医疗		0.043** (0.022)		0.234** (0.114)
是否享有城镇 职工医疗保险		0.037*** (0.009)		0.200*** (0.046)
居民幸福感		0.001 (0.001)		0.004 (0.007)
家庭人口规模		0.007*** (0.001)		0.038*** (0.007)
是否为离异家庭		-0.003 (0.016)		0.008 (0.086)
省级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城乡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Pseudo R ²	0.076	0.086	0.041	0.046
观测值	19 470	19 470	19 470	19 470

注:括号内是稳健标准误,*、**和***依次代表估计系数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后表同。表中报告的是 Probit、Tobit 模型的边际估计结果。

紧接着,研究采用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问题,以准确估计教育对捐赠行为的影响。通过这一方法,研究有效识别了教育对促进个人捐赠行为的因果关系,并证明教育在激励捐赠方面的积极作用。根据表 3,模型第一阶段显示,所选工具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其中“是否受到高校扩招政策影响”的估计系数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高校扩招政策显著提高了个体的受教育水平。依据

Wooldrige(2018)的标准,第一阶段的 F 统计值远高于 20^[35],且弱工具变量检验 AR 和 Wald 的 P 值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工具变量有效。进一步通过 IV-Probit 和 IV-Tobit 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在考虑内生性偏差后,教育对个人捐赠参与可能性及捐赠金额的正向影响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具体而言,个人受教育年限每增加 1 单位,其捐赠参与可能性预期增长 10.1%,而捐赠金额预期增加 8.4%。

总之,以上发现进一步强化了教育能够积极促进个人捐赠行为的观点,具体表现在提升个人捐赠参与率和捐助金额方面的重要作用。为此,通过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和支持,可以有效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进而推动社会福祉的整体提升,但具体如何通过教育提升个人捐赠行为,还需要借助进一步机制分析才能发现。

表 3 受教育水平对个人捐赠行为的影响:工具变量法

	IV-Probit		
	IV-Tobit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
	受教育年限	捐赠参与	捐赠金额
受教育年限		0.101*** (0.005)	0.084*** (0.007)
是否受到高校扩招 政策的影响	4.972*** (0.059)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省级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城乡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一阶段 F 值	378.50		
Wald		(478.83)***	(468.07)***
AR		(475.73)***	(463.44)***
观测值	19 470	19 470	19 470

注:表中报告的是 IV-Probit、IV-Tobit 模型的边际估计结果,后表同。

五、教育影响捐赠行为的机制:“经济—人文”双重价值

在具体分析教育对个人捐赠行为的影响机制时,本研究基于教育价值分类,将作用路径划分为两类:一是教育的经济价值;二是教育的人文价值。其一,在经济价值层面,教育的主要作用表现为提高个人收入水平,进而影响其捐赠行为。其二,在人文价值层面,教育通过提升个体在观念和实践两方面的社会化程度而推动其捐赠行为。为进一步揭示教育的经济价值和人文价值对个人捐赠行为产生的影响,本研究拟采用中

介模型进行分析。

(一)教育的经济价值驱动个人捐赠参与,但并不必然增加捐赠金额

大量教育经济学研究表明,教育投入具有显著的经济价值,较高的受教育水平能促进个人获取更优质的就业机会和职位,从而提高收入水平。理论上,随着教育水平的提升,个人的经济能力和可支配收入增加,捐赠参与的可能性及捐赠金额也会相应提高。为检验教育对个人捐赠行为影响的经济价值路径,本研究选取个人收入水平作为关键变量进行估计,并参考 Dippel et al.(2020)的研究方法^[36],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下文同)。

首先,研究发现,教育的经济价值显著驱动个体参与捐赠。表 4 第(1)列显示,教育对个人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影响,估计系数达到 0.194,并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一结果充分验证教育在提升个人收入水平方面的有效性。进一步观察表 4 第(2)列,在加入个人收入水平变量之后,受教育水平对捐赠参与的影响大幅下降,且估计系数不再显著,这一结果暗示个人收入水平可能在教育与捐赠参与之间扮演着完全中介的角色。然而,根据 Preacher & Hayes(2008)的研究^[37],他们建议放弃“完全中介”的概念,认为该中介效应应当被视为部分中介。基于这一观点,这一发现可解释为教育通过提高收入水平来促使个人参与捐赠。

表 4 受教育水平对个人捐赠行为的影响:经济价值

	(1)	(2)	(3)
	个人收入	捐赠参与	捐赠金额
受教育年限	0.194*** (0.007)	0.001 (0.007)	0.072*** (0.012)
个人收入		0.219*** (0.015)	0.060 (0.054)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省级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城乡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一阶段 F 值	378.50	132.64	132.64
观测值	19 470	19 470	19 470

其次,研究证实,教育的经济价值并不必然带来捐赠金额的增加。表 4 第(3)列显示,尽管加入收入水平变量,受教育水平对捐赠金额的影响有所下降,但个人收入水平对捐赠金额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一结果暗示,虽然教育主要通过提高个人收入水平来促进捐赠参与的积极性,但这种经济能力的增强并不必然转化为捐

赠金额的显著增长。因此,教育对捐赠金额的贡献需进一步研究以揭示更为细致的作用机制。

(二)个人捐赠金额的提升主要依靠教育的人文价值

教育不仅是促进个人收入水平提升的重要途径,而且在个人社会化过程中,它还起到培育人文价值的关键作用。为衡量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的观念与实践两个维度,本研究引入两个变量:一是反映观念层面的“利他意识”,二是指代实践层面的“社会互动”,以此来评估教育在人文价值方面的效用。

首先,研究表明,教育通过增强个体的利他意识,从而提升其捐赠参与。利他意识是个体价值体系的一部分,反映其对社会互助的认识。教育通过传授知识和价值观,使学习者内化这些观念,增强其对社会正义和公共福祉的理解,从而激发捐赠行为的内在动力。实证研究使用 CFPS 2018 年版中关于“亲和性:为他人着想”的问卷来衡量个体的利他意识。

通过表 5 第(1)列可以发现,教育对于塑造利他意识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审视第(2)列,在引入利他意识作为中介变量后,受教育水平对捐赠参与的正向影响有所减弱。这表明教育主要通过提高个体的利他意识来发挥作用,从而增加个体参与捐赠活动的概率。然而,观察表 5 第(3)列可以发现,尽管增加受教育水平可以通过培养利他意识来提升捐赠参与的概率,但其对捐赠金额的正向影响并不明显。这一点揭示了一个更为复杂的现象,即教育对捐赠金额的影响机制可能涉及其他因素,并非仅通过利他意识的增强就能充分解释。因此,研究需进一步探讨教育如何通过其他途径或在不同条件下促进捐赠金额的增长。

其次,研究证实,教育主要通过增强个体的社会互动强度来提高捐赠参与率和捐赠金额。与利他意识不同,社会互动关注个人与他人的实际沟通和交流,这种互动直接促进社会参与,反映个体融入社会群体的程度,属于实践性的社会化层面。理论上,教育通过推动个体融入社会群体,可能会增强社会学习效应,促进捐赠行为的社会模仿,或加强社群内部的信任和归属感,并增加个体对捐赠信息的了解,从而提高捐赠概率和金额。参照现有文献^[38],本研究分别选取 CFPS 问卷中“使用互联网社交的频率”以及“使用互联网社交的频率”×“互联网作为信息渠道的重要程度”作为衡量个人社会互动水平的代理变量。

表 5 受教育水平对个人捐赠行为的影响:利他意识与社会互动

	(1)	(2)	(3)	(4)	(5)	(6)	(7)	(8)	(9)
							社会互动		
				社会互动			(使用互联网社交		
	利他意识	捐赠参与	捐赠金额	(使用互联网	捐赠参与	捐赠金额	的频率×互联网	捐赠参与	捐赠金额
				社交的频率)			作为信息渠道的		
							重要程度)		
受教育年限	0.004*** (0.001)	0.035*** (0.005)	0.084*** (0.005)	0.191*** (0.004)	0.034*** (0.005)	0.055*** (0.006)	0.964*** (0.019)	0.033*** (0.004)	0.053*** (0.006)
利他意识		0.881*** (0.064)	-0.120 (0.264)						
社会互动 (使用互联网社交的频率)					0.111*** (0.012)	0.139*** (0.006)			
社会互动 (使用互联网社交的频率× 互联网作为信息渠道的 重要程度)								0.021*** (0.002)	0.028*** (0.003)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省级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城乡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一阶段 F 值	378.50	21.64	21.64	378.50	353.58	353.58	378.50	418.68	418.68
观测值	19 470	19 470	19 470	19 470	19 470	19 470	19 470	19 470	19 470

通过对表 5 第(4)(7)列回归分析发现,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个人的社会互动水平显著增强。进一步,表 5 第(5)(8)列和(6)(9)列在引入“社会互动”作为解释变量后,受教育水平对个人的捐赠参与及捐赠金额估计系数的影响明显降低,同时,社会互动对捐赠参与和捐赠金额均显示出正向效应。这一结果揭示:尽管增强利他意识重要,但不足以直接增加捐赠金额。相比单纯提升意识,教育通过增加社会互动更能提升捐赠金额。在教育传递人文价值时,实践层面(即社会互动)比观念层面(即利他意识)在促进捐赠方面更关键。研究强调,教育过程中不仅要注重利他意识的灌输,更应通过实践加强其应用。这种互动不仅帮助学生理解和体验利他行为的社会价值,还能实际提高他们未来社会参与的积极性和捐赠行为可能性。

总体而言,教育对个体捐赠参与的影响主要通过两条途径:一是通过提升个体的经济收入,即教育的经济价值;二是通过促进个体更为复杂的社会化过程,即教育的人文价值。具体来说,教育不仅强化了个体的利他意识,还促进了其社会互动强度。而教育在增加捐赠金额方面的影响,则更多依赖于其人文价值,尤其是在提升实践层面的社会互动方面,已被证实是推动

捐赠金额增长的关键因素。

六、教育影响捐赠行为的群体差异

在探讨教育如何影响不同群体的捐赠行为转化效果时,本部分通过异质性分析,以检验教育对捐赠行为的影响是否存在群体差异,具体包括城乡户籍和性别方面的不同。表 6 结果揭示了以下现象:在捐赠参与方面,教育水平的提升对于农村户籍居民的捐赠参与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一作用在城市户籍居民中则相对较弱。此外,教育对男性捐赠参与的概率显著高于女性。然而,当关注捐赠金额时,情况则有所不同。教育水平的提升对城市户籍居民捐赠金额的影响更为明显,而对女性捐赠金额的影响则超过了对男性的影响。

七、稳健性检验

(一)样本区间选择敏感性检验

为确保研究结果不受宏观时间趋势的影响,本研究采用稳健性检验方法。一个潜在问题是,随着时间推移,社会文化演进可能导致捐赠参与和捐赠金额自然增加,这种增长可能并非由受教育年限提升驱动,而

仅仅是时间演进的结果。为了区分受教育年限提升与时代变迁对捐赠行为的独立效应,研究聚焦于高校扩招政策影响的特定时间窗口。特别地,1999 年实施的高校扩招政策主要影响了 1981 年 9 月及以后出生的个体。因此,研究将样本限定在出生日期为 1981 年前后

6 到 8 年,以观察估计结果的变化。表 7 结果显示,受教育年限的提升对个体捐赠参与和捐赠金额依旧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估计结果与前文相比变化不大。这一结果进一步强化了教育对捐赠行为影响的独立性。

表 6 受教育水平对个人捐赠行为的影响:异质性分析

	城市地区		农村地区		男性		女性	
	捐赠参与	捐赠金额	捐赠参与	捐赠金额	捐赠参与	捐赠金额	捐赠参与	捐赠金额
受教育年限	0.093*** (0.006)	0.091*** (0.009)	0.111*** (0.007)	0.074*** (0.009)	0.117*** (0.008)	0.080*** (0.011)	0.092*** (0.005)	0.087*** (0.009)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省级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一阶段 F 值	188.44	188.44	173.70	173.70	139.74	139.74	258.06	258.06
AR	(222.42)***	(219.87)***	(235.68)***	(281.76)***	(231.52)***	(227.21)***	(245.49)***	(238.13)***
Wald	(225.07)***	(223.75)***	(235.30)***	(287.04)***	(228.79)***	(225.18)***	(249.54)***	(243.06)***
观测值	9472	9472	9998	9998	9097	9097	10 373	10 373

表 7 受教育水平对个人捐赠行为影响:样本区间选择敏感性结果

	IV-Probit	IV-Tobit	IV-Probit	IV-Tobit	IV-Probit	IV-Tobit
	捐赠参与	捐赠金额	捐赠参与	捐赠金额	捐赠参与	捐赠金额
样本区间年份	1975—1987		1974—1988		1973—1989	
受教育年限	0.066** (0.026)	0.093** (0.040)	0.082*** (0.021)	0.103*** (0.033)	0.078*** (0.016)	0.107*** (0.025)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省级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城乡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一阶段 F 值	69.34	69.34	85.39	85.39	100.50	100.50
AR	(6.93)***	(6.74)***	(15.24)***	(15.95)***	(22.38)***	(22.91)***
Wald	(7.05)***	(6.89)***	(15.55)***	(16.35)***	(22.93)***	(23.58)***
观测值	4438	4438	5311	5311	6192	6192

(二)剔除特殊样本的影响

在本研究中,捐赠参与和捐赠金额的变量未能区分个体自发捐赠与单位组织捐赠行为。为确保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在此部分进行了稳健性检验(见表 8)。具体而言,研究从样本中剔除个人所在单位最易发生捐赠的类别,包括政府部门/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事业单位以及国有企业等。结果显示,受教育水平与个人捐赠参与及捐赠金额仍然呈现出显著的正向关系。这表明,受教育水平对捐赠行为的促进作用在控制单位组织捐赠的情况下依然稳健。

(三)基于模糊断点设计的工具变量估计

通过前文研究受教育水平对捐赠行为的影响,我们已经了解教育在公益行为中的作用。在此部分,我们采用基于模糊断点设计的工具变量估计,这种设计

表 8 受教育水平对个人捐赠行为的影响:剔除特殊样本的群体

		IV-Probit	IV-Tobit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受教育年限	捐赠参与
受教育年限		0.106***	0.081***
		0.005	0.007
是否受到高校扩招政策的影响	4.999***		
控制变量	0.065		
省级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城乡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一阶段 F 值	279.68		
Wald		(447.86)***	(425.53)***
AR		(447.68)***	(423.73)***
观测值	17 016	17 016	17 016

的意义在于,它能够在教育决策接近临界点时,更精确识别出高等教育对捐赠行为的因果效应。具体而言,我们剔除初中及以下受教育水平的样本数据,并将受教育水平为大学及以上的个体赋值为 1,而将受教育水平为高中的个体赋值为 0,以此来区分是否具有大学受教育程度。通过分析表 9,我们发现高校扩招政策显著提高了个体的受教育水平,使大学教育的参与率增加了 16.5%。更为重要的是,与普通高中相比,高等教育显著提高个体的捐赠参与率和捐赠金额。这进一步表明,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对个体的社会责任感和捐赠行为具有重要影响。

图 3 中,垂直线标识了截断点,区分了未受到和受到高校扩招政策干预的个体。散点图表示每年出生的个体接受大学教育的概率,而曲线则为大学教育与出生年份之间关系的 LOWESS 拟合曲线。图 3 显示大学教育参与和捐赠行为在越过截断后存在明显向上的“跳

跃”。从而在图形层面验证了基于模糊断点设计的工具变量估计的有效性。

表 9 受教育水平对捐赠行为的影响:
基于模糊断点设计的工具变量估计结果

	IV-Probit		IV-Tobit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
	受教育年限	捐赠参与	捐赠金额
是否具备大学及以上受教育程度		0.259*** (0.069)	0.516* (0.311)
是否受到高校扩招政策的影响	0.165*** (0.028)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省级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城乡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一阶段 F 值	31.15		
观测值	3509	3509	35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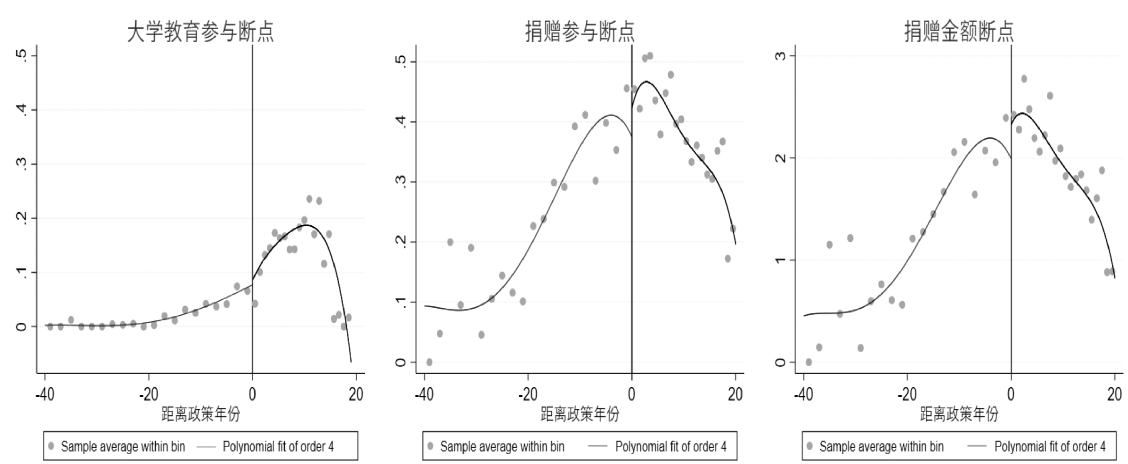


图 3 大学教育与捐赠行为的断点图

八、结论和讨论

为探索教育在推动第三次分配公平中的作用,本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利用工具变量法和中介效应模型,估计了个人受教育水平对捐赠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教育在促进第三次收入分配公平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教育分别促使捐赠参与概率和预期捐赠金额增加 10.1% 和 8.4%。为进一步探究教育对捐赠行为影响的具体途径,本研究进行了中介机制分析,研究结果揭示,教育通过提高个人收入(经济价值)和促进复杂的社会化过程(人文价值),如利他意识和社会互动,促进个人的捐赠参与;然而,教育提升个人收入的效应却并不一定会转化为捐赠金额

的增加,捐赠金额增加的驱动力主要源自教育的人文价值,其中,社会互动的提升是关键。此外,教育对捐赠行为的影响存在群体差异。具体而言,教育对农村居民和女性的捐赠参与具有更明显的激励效应,而在城市居民和男性中,教育则与更高的捐赠金额相关。

本研究的实证发现为已有研究提供了有益补充。其一,本研究通过计量方法呼应了教育学基础理论中的一个经典命题——教育具有促进个体社会互动的人文价值。研究发现,尽管个人的捐赠参与率依赖于教育的经济和人文价值共同推动,但捐赠金额的增加主要由教育的人文价值所驱动,而且,该人文价值的发挥在于社会互动的增强。依赖社会互动的人文价值也是杜威所强调的“联合生活”的道德影响:“人类的联合生

活对形成智力的和道德的倾向具有支配地位的影响。”^[19]

其二,本研究丰富了教育促进共同富裕的相关研究。在探索教育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时,已有研究往往将教育的作用定位于教育的人力资本机制,诸如教育通过人力资本促进经济增长为共同富裕提供基础、教育通过提高个人劳动生产率而改善个人收入、普及化或补偿性的教育措施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等,但本研究证实,教育促进共同富裕的潜在作用不仅局限在人力资本机制,还在于教育的人文价值,二者共同促进了个人间的转移支付。教育的人文价值也回应了厉以宁最初在阐述第三次分配时对“道德力量”的强调。

总体而言,本研究强调了教育人文价值的重要性及其对第三次分配的贡献。就教育促进第三次分配的作用而言,教育人文价值的重要性大于经济价值。而且关键在于,强化教育过程中的社会互动性,将更有助于激发教育的人文价值并转化为个体间的转移支付行为,促进第三次分配。

参 考 文 献

- [1]新华社.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EB/OL].(2021-08-17)[2024-04-06].https://www.gov.cn/xinwen/2021-08/17/content_5631780.htm?_type=bgxz.
- [2]厉以宁.论共同富裕的经济发展道路[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5):3-13.
- [3]厉以宁.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77-78.
- [4]黄斌,李波,方超.教育促进共同富裕的独特作用:理论应然与经验实然[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3,41(10):12-26.
- [5]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M].巴曙松,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 [6]RAFTERY A E, HOUT M. 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 expansion, reform, and opportunity in Irish education, 1921—1975[J]. *Sociology of education*, 1993, 66(1): 41-62.
- [7]LUCAS S R. Effectively maintained inequality: education transitions, track mobility, and social background effect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1, 106(6): 1642-1690.
- [8]杜育红,郭艳斌.教育与收入分配:理论的逻辑与现实的证据[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3,41(10):1-11.
- [9]袁志刚,阮梦婷,葛劲峰.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共同富裕:教育视角[J].上海经济研究,2022(2):43-53.
- [10]张羽,刘惠琴,石中英.教育投入产出的人文属性[J].教育研究,2022,43(8):121-140.
- [11]屈廖健,刘华聪.能力测评转向:经合组织学生社会情感能力调查项目研究[J].比较教育研究,2020,42(7):90-97.
- [12]闵维方,曹晓婕.教育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研究[J].教育经济评论,2022,7(6):3-20.
- [13]罗公利.论经济社会学视角下的社会捐赠[EB/OL].(2010-10-08)[2024-04-06].<https://www.scf.org.cn/cs/jjh/n3421/n3895/n3896/u1ai250586.html>
- [14]BECKER G S. 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human behavior[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282-294.
- [15]GNEEZY U, RUSTICHINI A. Pay enough or don't pay at all[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0(3): 798-807.
- [16]ANDREONI J. Impure altruism and donations to public goods: a theory of warm-glow giving[J]. *The economic journal*, 1990, 100(401): 464-477.
- [17]WEBER M. Economy and society: a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M].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24-25.
- [18]帕特南.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M].刘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64.
- [19]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16-29, 40.
- [20]BRYANT W K, JEON-SLAUGHTER H, KANG H, et al. Participation in philanthropic activities: donating money and time[J]. *Journal of consumer policy*, 2003, 26(1): 43-73.
- [21]MITANI H. Influences of resources and subjective dispositions on formal and informal volunteering[J]. *Volunt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2014, 25(4): 1022-1040.
- [22]刘武,杨晓飞,张进美.城市居民慈善行为的群体差异——以辽宁省为例[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2(5):426-432.
- [23]胡荣,沈珊.中国农村居民的社会资本与捐赠行为[J].公共行政评论,2013,6(5):60-75.
- [24]YEN S T. An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household donations in the USA[J]. *Applied economics letter*, 2002, 9(13): 837-841.
- [25]SRNKA K J, GROHS R, ECKLER I. Increasing fundraising efficiency by segmenting donors[J]. *Australasian marketing journal*, 2003, 11(1): 70-86.
- [26]杨永娇,张东.中国家庭捐赠的持续性行为研究[J].学术研究,2017(10):51-59.
- [27]王道俊,郭文安.教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14.
- [28]叶澜.教育概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10.
- [29]SCHULTZ T M.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1, 51(1): 1-17.
- [30]MINCER J. Schooling, experience and earning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 [31]涂尔干.道德教育[M].陈光金,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35-236.
- [32]方超,黄斌.高校扩招政策与乡城转移劳动力的教育收益

率——基于模糊断点设计的工具变量估计[J].中国高教研究,2021(6):44-50.

[33]鄢伟波.高等教育溢价变动的新趋势与解释——以流动人口为例[J].劳动经济研究,2022,10(5):23-54.

[34]宋旭光,何佳佳.家庭化迁移经历对代际流动性的影响[J].中国人口科学,2019(3):92-102.

[35]WOOLDRIDGE J M. Introductory econometrics: a modern approach (7th Edition)[M]. Boston: Cengage, 2018: 512.

[36]DIPPEL C, FERRARA A, HEBLICH S. Causal mediation analysis in instrumental-variables regressions[J]. The stata journal, 2020, 20(3): 613-626

[37]PREACHER K J, HAYES A F. Asymptotic and resampling strategies for assessing and comparing indirect effects in multiple mediator models[J]. Behavior research methods, 2008, 40(3): 879-891.

[38]刘宏,马文瀚.互联网时代社会互动与家庭的资本市场参与行为[J].国际金融研究,2017(3):55-66.

How Does Education Promote Fairness in the Third Distribution?
An Empirical Exploration Based on the “Economic-Humanistic” Values of Education

Xin Wang¹, Cheng Liu², Ruxian Yun²

(1.Institute of Food and Strategic Reserves,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jing 210023;
2.Institute of Educ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Abstract:The Tenth Meeting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for Financial and Economic Affairs has incorporated the third distribution into the foundational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to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among all people. Education is an effective means to advance common prosperity. However, previous research has primarily focused on the role of education in the initial distribution and redistribution, paying less attention to its role in the third distribution. To address this research gap, this paper, based on data from th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employs instrumental variable methods to explore the unique role of education in enhancing individual donations and its underlying mechanisms. The study finds that education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both the participation rate (10.1%) and the amount of donations (8.4%) by individuals. The improvement in the participation rate is attributed to the synergistic effects of the dual values of education in “economic –humanistic” terms, while the increase in donation amount relies on the “humanistic” value of education, with social interaction playing a crucial role. The study highlights the pivotal role of education in promoting the third distribution, emphasizing that its “humanistic” value is more significant than its “economic” value. Enhancing social interaction within the educational process is crucial for fully realizing the “humanistic” potential of education.

Key words: common prosperity; third distribution; education; donation; social interaction

责任编辑 张河森